

毛泽东思想研究论丛

(一)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专集)

广西师大政治系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一九八三·十二·桂林

前 言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事件。这个伟大事件象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伟大事件一样，必然会有它自己的理论表现。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要研究中国人民大革命，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就要研究毛泽东思想。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我们还刚刚开始。今后我们将从各个方面进行专题的综合的研究，并将系统地持久地开展起来。

今年，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这里汇集了我们开展初步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些体会，以为纪念。很肤浅也一定存在缺点错误，希望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目 录

试论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民主

革命的基本思想……………蒋文华(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袁竞雄(1 5)

论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与共产国际

城市中心论的对立……………石舜瑾(3 7)

简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对马列主义暴

力革命学说的贡献……………伍婉萍(5 3)

略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林雨如(6 3)

略论毛泽东关于从思想上建党的论述对马

列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兰常周(7 6)

高等教育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同志对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林凤鸣(8 9)

一个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纲要……………周业昌(9 8)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理论的新发展……………曾道宏(1 0 2)

毛泽东同志对列宁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

不平衡规律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田 工(1 1 0)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吴先逵(1 2 4)

毛泽东同志对调查研究理论的贡献……………潘宝卿(1 3 7)

梁贯珍

浅谈毛泽东的“哲学就是认识论”……………潘明禄(1 5 4)

试论大革命时期毛泽东 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

蒋文华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工作，对于形成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的完整体系有着伟大的贡献。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本文拟就这方面作初步探讨，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行动的指南。但是它没有提出解决任何一个国家的一切问题的万应灵丹，它只有同同一个国家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显示强大的生命力。而每个国家由于它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民族历史等都有自己的特点，因而革命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就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着教条去到处套用，不能一切靠“本本”，也不能照搬别国的现成经验，只能创造性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在不断的实践和反复总结的过程中，认识和掌握国情，探索和寻

找本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这是各国共产党领导本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必经之路。

我党在初创时期，曾经根据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提出了奋斗目标。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照现在看来，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所以一国的阶级斗争可以使其他国家受同一的影响。1917年11月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结果，使俄罗斯的阶级斗争变成劳农专政的方式。所以在其他国家内的阶级斗争也日见紧迫，他的趋向是向着与俄罗斯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同年《共产党》月刊第一号《短言》中明确指出：“我们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里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②。我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有如此主张。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中说：“今日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靠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不可”③。陈独秀在《谈政治》中也说：“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④。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规定：“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成品等生产资料”⑤。以上论述，明确提出了党的最终目的，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奋斗的方向，毫无疑义都是正确的，但是也很清楚说明，此一时期党

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对于中国革命必须首先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没有认识的，因此提出了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这显然是脱离了中国实际的。党的“一大”以后，从1922年党的“二大”到1925年党的“四大”，以及五卅反帝运动的实践，党对中国民主革命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党对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认识有了重大进步。1922年5月，党领导下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认识了“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也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时常压迫我们杀戮我们的领袖，枪击我们的兄弟，禁止我们的罢工，剥夺我们的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我们认定这些敌人一日不除掉，我们一日不能得到些微的自由”⑥。在同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把“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作为团的三条政治方针的第一条⑦。6月党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等政治主张⑧。7月党的“二大”，集中当时党内正确主张，制定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且对工人、农民、大资产阶级作了初略的分析：指出无产阶级由于它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将会变成推翻”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其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

外迅速成功。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并且将农民分为“富足的农民地主”；“独立耕种的小农”；“佃户和农业雇工”三个阶层。指出“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也是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成为无产者而“加入到革命队伍里面来”^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

1923年“二七”惨案以后，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党从血的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于是党的“三大”确定了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合作，将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方针。1924年元月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革命又由低潮逐渐转入高潮。革命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如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底应由谁来领导，在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中到底以哪个阶级和哪个阶级的联盟为基础，在几个民主阶级中，到底哪些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朋友，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谁是朋友，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怎样，都需要党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加以回答。从1924年到1927年革命失败以前，党做了许多探索。1924年2月李大钊在《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的讲演词中说：“在国民革命当中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⑩，11月邓中夏发表了《我们的力量》中明确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⑪。1925年1月党的“四大”集中了党当时探索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成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初步分析，明确提出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必须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得到胜利”。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中主要成份，

并且他们因利益关系，天然的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党和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尽可能的系统的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否则“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对于小商手工业者和生活不安定的知识阶级等小资产阶级，大会认为他们都希望有一个民族德谟克拉西的革命。而“大商买办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都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据此，大会提出无产阶级要“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⑫。党的“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对其它阶级的分析也是基本正确的。它对于初步形成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作出了贡献。然而，还是有缺陷的。“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还是一般口号，而且受彭述之“天然领导权”的影响。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曾经严肃指出这个问题，他说：“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述之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所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来了一个反共，我们毫无准备”^⑬对于农民问题，“四大”也没有能够从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农民。没有能够从经济地位上分析农村的各阶层。因而也就难以解决无产阶级在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这样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也就难以实现。四大决议还错误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还没有能够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

1925年5月在我党的领导下，爆发了席卷全国的五卅反帝革命风暴。五卅运动从政治上检验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级在革命中的政治态度充分暴露了。使我们党能从实践斗争中对社会各阶级有了新的认识，从活生生的事实中体验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体验到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妥协性的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凶恶的敌人。从而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1925年7月周恩来《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六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正确地论述了“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⑭，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强调指出“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中国社会所需要的”，“要注重工农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⑮。1925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上首次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此后从1925年至1927年春，又连续发表了《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前途和领导权等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从而集中了当时党内正确主张，发展了党的“四大”的正确方面，克服了它不足方面，初步提出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

二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

本思想是：“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一切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⑩它的主要论点是：

（一）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是否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是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党曾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许多探讨。早在1919年2月李大钊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中就指出“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政治或社会里的运动，都是解放运动，是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民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⑪。1925年党的“四大”指出“自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形式——帝国主义，它直接的或间接的支配了全世界之经济，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亦因之各异，在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国家，逐渐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东方殖民地的国家逐渐形成多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两种革命运动都含有世界性，这种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⑫。这些分析是正确的，但它不够全面，它没有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处在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已经明确认识到

中国革命处于新的历史时代，即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①⑨}。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在国内“工农阶级已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出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的新时代，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的历史阶段^{②⑩}。在这样的时代里，中国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中国革命不能再走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也不能再走辛亥革命的老路。

（二）工人阶级是民主革命中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者。关于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党在“四大”和五卅运动前后，进行了有进展的探索。毛泽东集中和发展了它正确的方面，纠正了不正确的方面，作了科学的论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他把工人阶级分为工业无产阶级（主要是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工人）、都市苦力工人（包括搬运夫、人力车夫、粪夫、清道夫等）和农村中的雇农（指长工、月工、零工）等三部分。指出工业无产阶级，由于他们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先进的阶级；由于他们特别集中，由于他们经济地位低下，失去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受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极端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因而他们“特别能战斗”做了

城市工人运动反帝、反军阀反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力军。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他们除了双手，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与产业工人相似”。而农村中的长工、零工、“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毛泽东同志对工人阶级进行这样科学的分析，就把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思想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1926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论文中，就以明确的语言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坚定指出没有工人运动的兴起，排斥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

（三）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周恩来同志指出：1925年大革命以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②，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也指出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开始也是不懂得农民工作的重要性”，“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②。就在他在家养病期间，组织和领导了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建立了二十多个乡农民协会，创建了中共韶山支部，并领导农民向地主进行了阻止运粮外出、平抑谷价、增加雇农工资和减轻租额的斗争，进一步深入了解农村中各阶层的状况。同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

级的分析》中，对农民作了马列主义的分析，指出农民主要包括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三部分。自耕农即中农，其经济地位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点余钱剩米的，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绝大部分的半自耕农和贫农同属于半无产阶级，其经济状况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优于贫农，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资金，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优于另一部分贫农，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另一部分贫农既无充足农具，又无资金，债务丛集如牛负重。基于以上分析，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是指他们的问题”，1926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进一步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然若无农民阶级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的特权，则军阀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927年初，正当封建地主阶级、军阀、国民革命军中的反动军官恶毒攻击农民运动，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责难农民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二月十六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行动的问题。三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坚决主张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放手发动农民斗争，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村革命政权，进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此时期毛泽东还

主办了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大批农运骨干，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解决了农民问题。

（四）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这个问题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它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党的“四大”前后，我们党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党的“四大”决议上，虽然已明确中国的大商买办阶级是“遂一日强一日”，它们对外“依赖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外货外资）”对内“勾结军阀政府，以重利盘剥国家，掠夺平民”它们“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是反革命派，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但是它又错误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渡中”^{②③}。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在19世纪末，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了。由于在理论上的错误，就把本来已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推到买办官僚资产阶级那一边，当作革命的敌人来看待，这就增强了敌人，孤立和削弱了自己。毛泽东初次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以最明确的科学概念，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一样“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是“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

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这是一个动摇不定的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同志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为我党同资产阶级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及在统一战线中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五）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论文中，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发，从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内而统治阶级主要是指封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军阀和贪官污吏，以及附属于他们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而“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

“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它和买办阶级一样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始终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而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军阀、贪官污吏压迫统治中国的靠山。基于以上分析，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使革命归于失败，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使革命获得胜利。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势力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

（六）中国民主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的国家政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主张推

翻什么阶级的国家政权，建立什么阶级统治的国家，这是一个革命运动性质的最后体现，也是领导权思想的最集中的体现。1925年和1926年，随着革命群众运动的不断高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全国正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前夜，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动，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也日益尖锐。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右派，处心积虑地想把革命领导权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去，以便扭转革命的方向。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鼓吹所谓“戴季陶主义”，妄图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控制革命局势，使革命沿着他们的反革命需要发展，以便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1926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上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对“戴季陶主义”的反革命宣传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指出在国际国内新的历史条件下，还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是根本行不通的。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联合统治的国家”。这就明确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目的，说明了中国推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是行不通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这是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

综上所述，毛泽东同志集中了大革命时期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主张，初步地阐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萌芽的集中体现。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后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实践检验，不断地完善、丰富、发展，形成了完整的无产阶级

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

注解：

①《中国共产党宣言》（见《党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辑）

②、④、⑤、⑧、⑦、⑧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⑩见《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357页，130页）

⑨同③500页

⑩、⑪、⑬、⑰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

⑫、⑳《周恩来选集》上卷159页，179页

⑭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46页）

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12页）

⑯《毛泽东选集》4页

⑰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见《政治周报》）

⑱《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06页

⑳见《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7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